个，没有汉语或苗瑶、壮侗两个语族中那种复杂的声调系统。它们在声调形成过程中，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因为诸语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和大体上相似的发展途径。这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联系。总的说来声调是附属在元音上的，松紧对立也是表现在元音上，它们在音理上有共同的特征，在发一个音节时，都要颤动声带，因此，元音的松紧和声调在发音上有密切的关系。在发紧元音时，由于紧缩了声带，单位时间内声带颤动的次数就相对地增加。声调是音高升降变化的不同。“依实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音之所以有锐化（或高低）乃是“频率”（frequncy）的关系；颤动数多的是锐音（或高音），颤动数少的是钝音（或低音）”。① 从上面我们所列举的对应例词来看，凡是紧元音音节，在有声调的语言（或方言、土语），都读为较高的声调；凡是松元音音节便读为较低的声调（布朗语有一个声调（˧₃₃）与岩帅话松元音相对应，那是因为布朗语出现在这个调类里的音节的辅音尾是 -ʔ、-p、-t、-k）。

在《论古代佤语的元音系统》② 一文中，曾用现代佤语方言的语音对应关系构拟了古代佤语的元音系统，认为古代佤语没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佤语松紧元音的对立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那么细允话声调的形成，是起源于元音的松紧？还是在元音松紧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呢？

我认为细允话的声调一开始是同其它要素（如元音松紧）并存并用，在发展过程中被声调所代替。这可从佤语佤方言的孟汞话由于元音的松紧对立而蕴育出来的声调的萌芽看出端倪。孟汞话的紧元音音节可读为全降调，松元音音节可读为低降调，也就是说元音松紧与声调高低是相结合的。如：

baN̰	天	baN̖	核，子实
tiŋN̰	三弦	tiŋN̖	大
bɔN̰	水井	bɔN̖	堆
pɔnN̰	四	ponN̖	能

可以看出，上述的例证，孟汞话元音松紧对立正处于向声调对立的过渡状态。另一方面，现代孟汞话松紧元音的特点与巴饶克方言已有所不同。孟汞话发紧元音，在生理上主要是咽头肌肉紧缩，舌及口腔壁肌肉并不紧张。紧张期在二合元音也只发生在主要元音上。由此，我们认为处在阿佤方言与巴饶克方言之间地带被有声调语言包围的细允话，其声调的对立可能是从松紧对立演变而成的。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要了解某一语言及其发展规律，就必须把这一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细允的佤族群众，所居住的地区，周围都是汉族、拉祜族村寨。就是细允本寨也杂居了少数汉、拉祜、哈尼等民族。他们为了交际需要，除了用佤语进行交际外，还学会了汉语、拉祜语，是典型的多语区。我们在进行社会语言调查时了解到，所调查的42人中，兼通汉话的有37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8%；兼通拉祜语的有2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2%，因此，细允话声调的形成与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以及外族语言的影响不是没有关系的。

① 王力《汉语音韵学》第25页，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

② 周植志、颜其香《论古代佤语元音系统》载《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

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

阎 万 章

1965年6月，在辽宁省法库县柏家沟乡前山村发现了辽墓一座。墓内出土有辽大安六年（公元1090年）《萧袍鲁墓志铭》一合。上刻汉字楷书志文三十八行，行四十一字。志盖呈覆斗式。平顶处刻汉字篆书“故北宰相萧公墓志铭”三行九字，盖背面中间刻契丹字楷书志文十五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者为二十五字。背面所刻的汉文是：右上角刻“阿閦如来 灭轻重罪 障陀罗尼”，左上角刻“顶陀罗尼 一切如来灌 一切如来阿 毗三摩耶 百字密语”。在契丹字志文第四行之下刻“生天真言”，第十五行下刻“破地狱真言智炬如来心”。四周刻梵文。

关于辽萧袍鲁墓的发现和发掘经过，还有墓内出土遗物和汉文墓志的全文，已有冯永谦同志《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一文发表于《考古》1983年第7期。但不知何故该文对志盖背面所刻的契丹字志文却只字未提，至今鲜有知者。

萧袍鲁，《辽史》无传，但在《辽史》中并非毫无记载，如《辽史》卷二十四《道宗纪》四中，则有大安元年（公元1085年）十一月“丁酉，以南女直详稳萧袍里为北府宰相”之记载，其中之“萧袍里”即墓志中之“萧袍鲁”无疑。不过在《辽史》中，只此一见外，再也找不到有关萧袍鲁的记载。因此，汉文《萧袍鲁墓志铭》不仅可以补《辽史》之阙，而且也是研究此志契丹字志文的重要资料。

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所刻之契丹字，与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中的契丹字是同类的，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契丹大字。我在《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① 一文中，谓之为契丹小字，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在没有得到明确证据之前，姑从众说而看做是契丹大字。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全文（见28页附录一），共计契丹字三百二十一个，据冯永谦同志统计汉文墓志共计一千四百五十一字，由于两志的字数相差悬殊，可知并非对译，今对契丹文墓志考释如下：

契丹文墓志第十五行（即志文的末行），刻有“年、月、日”等字样的契丹字十个，可知此行文字应是墓志的入土年月。据汉文墓志萧袍鲁于“大安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启手足于行帐，享年七十有二”，“以大安六年三月十九日，归葬于祺州娘子庄”。由此得知萧袍鲁卒于辽道宗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正月二十三日，葬于大安六年（公元1090年）三月十九日。按：大安六年的岁次是庚午，我在《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一文中，已经考出汉文中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十二支，在契丹文中是用十二属来表示的。因此，庚午年的“午”字，在契丹文中则是“马”字，那么志文第十五行所刻之十个契丹字，应释作“大安马六年三月十九日”（见28页附录二，4）。但“大安”年号如与契丹文《萧孝忠墓志》所载者相比，《萧孝忠墓志》第十七行所载之“大安”年号，其“安”字的笔画虽然刊刻不

① 拙著《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清，而与此墓志所载者却不大相同(见28页附录三，1)。正是由于《萧孝忠墓志》所载“大安”年号之“安”字笔画不清的缘故，所以我过去才将该墓志第七、八、十六行内所载之三个“大康”年号，都误释作“大安”，于是该墓志第八至第九行所载之“大康三蛇年”的“蛇”字，也因此而误释作“兔”，承蒙刘凤翥同志在《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①一文中指出，我表示完全同意。又此墓志文“马”字，与契丹文《萧孝忠墓志》和《北大王墓志》所载者，又都各不相同(见28页附录三，2)，但都释作“马”字则无疑义。此外，在契丹大字中，数词中的“六”和“九”字，过去一直不大明确，由于此墓志的出土而才得以肯定。

志文第一行末二字(见28页附录一)从其所在位置来看，似应释作“志”或“铭”。因为据贾敬颜同志所珍藏的契丹文墓志拓本（原石下落不明），在第一行的末尾也有此二字，虽然贾氏所藏拓本在此二字之下已经残缺，但仔细观察似无文字，所以我才认为似应释作“志”或“铭”。如以贾氏所藏拓本的第十二行来考察，此行共有契丹字三个(见28页附录三，3)，其中除末一字与汉文“合”字写法相同外，而在“合”字前面的两个契丹字，则与贾氏所藏拓本和《萧袍鲁墓志铭》的第一行末尾二字完全相同。由于贾氏拓本从第十三行起就是契丹字铭文，可知第十二行所载三个契丹字，则与汉文“铭曰”之意相当，证明贾氏所藏拓本和《萧袍鲁墓志铭》的第一行末二字都应释作“铭”，而不应释作“志”。此外，在《故太师铭石记》第三十五行和契丹文《北大王墓志》第二十一行内，也都载有相当于汉文“铭曰”之意的契丹字(见28页附录三，3)。已被刘凤翥、马俊山二人所释出②。其中相当于汉文“曰”字的契丹字，《故太师铭石记》所载者与贾氏所藏拓本作“合”字者相比，只是在“合”字的左边多了一个“人”字，虽不完全相同，可知应是一字。但《北大王墓志》所载者却不相同，其字如汉文“曰”字，而是把“曰”字中间的一横变成了中间一竖，我认为把此字释作“曰”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龙龛手鉴》卷一口部的入声中就载有此字，并注有“于厥反”字样，可知其读音为“曰”，虽然此字为方形，与《北大王墓志》所载作长方形者似有区别，但可明显看出契丹字之“曰”字是袭用汉字，其读音必与汉字读音相同，所以我才同意释作“曰”。再有，贾氏所藏契丹文墓志拓本和《故太师铭石记》所载相当于汉文“曰”字之契丹字，都是袭用汉字，是否也都释作“曰”，尚待进一步研究。至于相当于汉文“铭”字的契丹字，《故太师铭石记》和《北大王墓志》，都是用三个契丹字来表示的，这与贾氏所藏拓本和《萧袍鲁墓志铭》用两个契丹字来表示者虽不相同，但其末一字是相同的。如果把用两个契丹字表示者的第一个契丹字拆开而成为两个契丹字，或者是把用三个契丹字表示者的前两个字合在一起而为一字，那么就完全一致了。像这种可以拆开、合并的契丹大字，并未被刘凤翥、马俊山二人所指出，而在契丹大字中是否还有此种情况，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既然志文第一行末二字应释作“铭”，那么在“铭”字前面的四个契丹字(见28页附录一)，其第一字至第三字似应释作“墓志”。理由是：这三个契丹字与《北大王墓志》第一行末尾三个契丹字相同。从其所在位置来看，这是十分可能的，如果无误，其第四字在贾氏所藏拓本第一行的“铭”字前亦有此字，可知应与汉文中的“之”和“的”相当，所以志文第一行之末六字则释作“墓志之铭”（见28页附录二，1）。

① 刘凤翥《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

② 见刘凤翥、马俊山《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载《文物》，1983年第9期。

志文第五行有可以释作汉文为“十九”之契丹字两个(见28页附录二，2)，虽然释作“九”字之契丹字与志文第十五行“大安马六年三月十九日”中之契丹字“九”字（见28页附录二，4）微有不同，我认为当是一字，其正确写法应以第五行中之“九”字为是。

志文第十行有释作汉文为“守太子太傅”之契丹字五个(见28页附录二，3)，其中前面四个契丹字是袭用汉字，其字义与汉字完全相同，而末一字即释作“傅”的契丹字。因为它与相当于汉文十二支中的“辰”字的契丹字写法相同，所以我在《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中，释作十二属中的“龙”字。但在契丹小字中，“龙”字的读音为“禄”，在汉文中“禄”和“傅”的读音是不相同的，而在契丹小字中也是如此。那么，我为什么把释作“龙”的契丹大字，在这里又释作“傅”呢？这是因为在《辽史》卷四十七东宫三师府下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等官职，如果以契丹字的“龙”字读音为“禄”来加以考察，可知在志文“守太子太”四字下面的那个契丹字，则应释作“傅”，而不应释作“师”和“保”。只有释作“傅”，这样才和“禄”字的字音相近，所以志文中这五个字则释作“守太子太傅”无疑。这从汉文《萧袍鲁墓志铭》中的“命公为汤河女直详稳，……特授太子太傅”的记载，也可证明释作“守太子太傅”是正确的。

以上是我对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所作的考释。现将《萧袍鲁墓志铭》中还未被人们所知的契丹大字新资料摹写发表出来（见28页附录一），以便共同研究探讨。我想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定能取得新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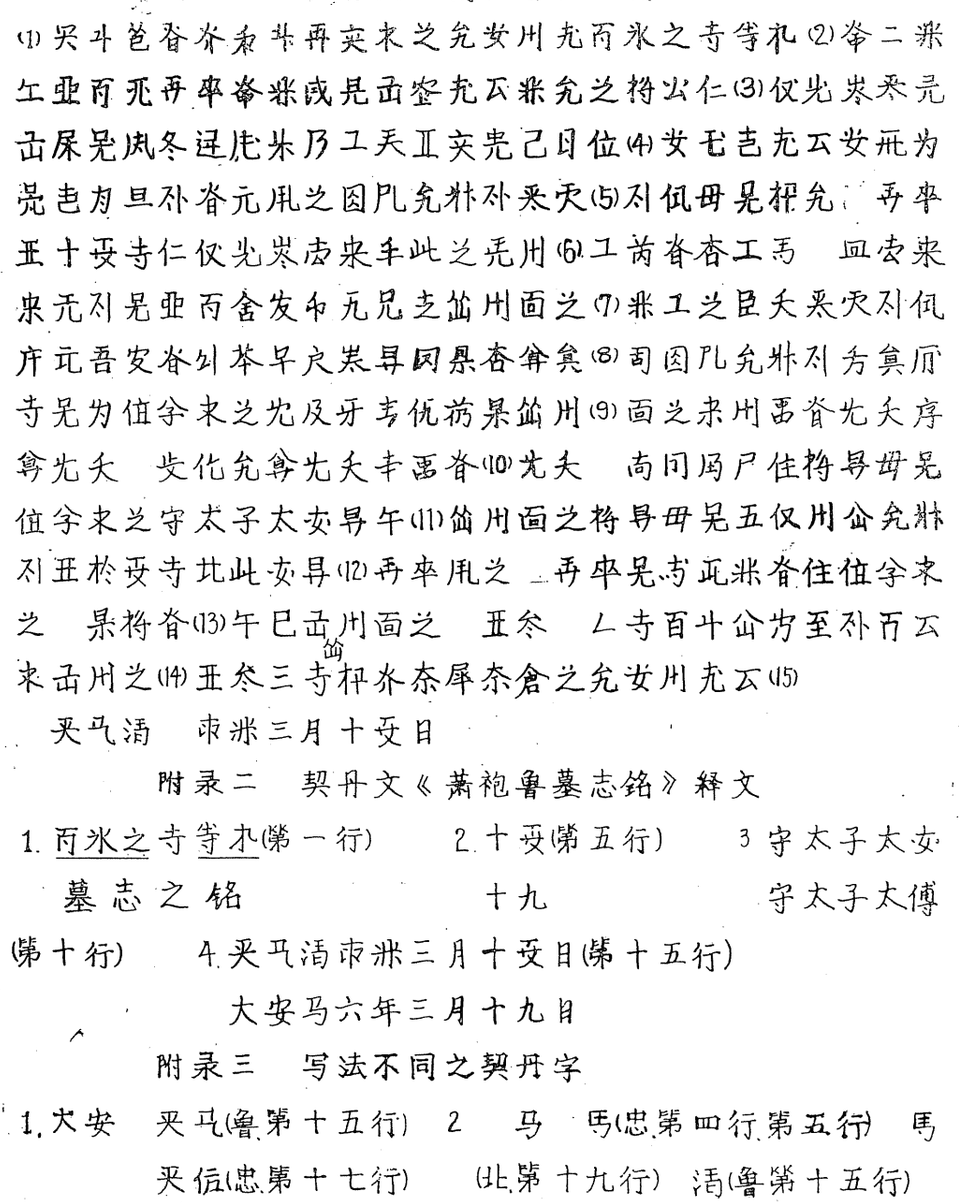
本文所引贾敬颜同志所藏契丹文墓志拓本中之契丹字，是据他在1974年1月所赠之拓本照片，承蒙他准许引用，我在这里表示感谢！再有，本文附录一之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全文，第十三行中第四字和第五字之间的右边那个契丹字，原石就是如此，当是遗漏而补刻者。又附录三中括号内所记契丹字之出处，“鲁”字代表《萧袍鲁墓志铭》，“忠”字代表《萧孝忠墓志》，“北”字代表《北大王墓志》，“贾”字代表贾敬颜所藏契丹文墓志拓本，“记”字代表《故太师铭石记》，特此说明。

纳西族东巴语言文字学术讨论会在云南丽江举行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与纳西文化学会联合举办的“纳西族东巴语言文字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3月25日至29日在纳西族故乡云南省丽江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的40余名专家、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纳西象形文字的起源、性质、与周围民族文字的关系以及东巴古籍整理中的若干学术问题。云南民族学院常竑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研究员，分别在会上作了题为《纳西东巴文在文字发展史研究中的地位》和《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地位》的学术报告。会议期间，国家民族古籍办、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古籍办、云南省古籍办的负责同志还共同研究了纳西东巴古籍的编目和缩微问题。会议自始至终由云南省民语委主任、东巴文化研究室主任和万宝同志主持。

李静生

附录一　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



夭马活　申兴三月十受日

附录二　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释文

1. 百兴之寺等木(第一行)　2. 十受(第五行)　3. 宇太子太安

墓志之铭　十九　宇太子太傅

(第十行)　4. 夭马活申兴三月十受日(第十五行)

大安马六年三月十九日

附录三　写法不同之契丹字

1. 大安　夭马(鲁第十五行)　2　马　马(忠第四行第五行)　马

夭伍(忠第十七行)　(北第十九行)　活(鲁第十五行)

3. 铭曰　等木合(贾第十二行)　坐寸木佮(记第三十五行)

坐寸木四(北第二十一行)

藏语天峻话的词的感情色彩

王青山

在现代藏语口语词汇中，含有感情色彩的词，数量众多，种类纷繁，形成了藏语词汇库中一个特殊的词汇现象。这些词中所包含的感情色彩，有些是单一的，有些则是互异的。它们并非都来自语言本身（包括词义和词的结构等）。人际关系、语言环境、甚至说话人所生活的社会或文化传统等都会赋予词语以某种感情色彩。由于藏语方言分歧，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我们不可能对上述复杂情况条分缕析进行面面俱到的剖析。为了确保语言材料的准确性，本文主要以藏语天峻话①（以下简称藏语，不赘）为例，对藏语口语词的感情色彩作一概括的描述与讨论。本文提供的材料和现象，如果对藏语词汇学研究和藏语与藏族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有点参考作用的话，那则是笔者的希望。

一

象其它语言一样，藏语中表示事物、性质、特征、动作、语气等类的词，特别是有关人、禽、兽、衣物、用具等词，都有不少带感情色彩。例如：

表示人的

skjak ɕor	胆小鬼	lto rkjal	饭桶	glu ba	歌手
bɕad mkhan	健谈者	gtɕes phrug	爱子	ŋgoŋ bo	饿死鬼、倒霉鬼

有关人名的

dbaŋ lo	旺洛（昵称）	skal sgrol	格卓（爱称）	tshe skjag	才加(蔑称)
rdor mdze	多泽（憎称）	ɕer rgyam	西嘉木（敬称）		

有关禽、兽的

khu lo	杜鹃（爱称）	spjaŋ rgan	老狼	smis go	猫儿
bja ŋan	恶鸟	g-jaŋ la	心爱的家畜②	g-jag ro	该死的耗牛

有关衣帽用具的

g-jaŋ sgam	财运柜	rtsag tɕhat	烂皮袄	sgam tɕhog	破烂柜子
gsol thur	筷子（敬语）	boɦu rdugs	蹩脚的枪	ʔa tɕhat	破靴子

① 本文大部分语言材料是笔者在天峻县天棚乡居住时搜集的。部分材料是该县的老师多加格洛夫妇提供。文中例句例词承蒙多加格洛老师复核、校正，并对本文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特此说明，以表谢意。

文内藏文转写用国际音标。藏文转写符号如下（按藏文字母表顺序排列）：

k、kh、g、ŋ、tɕ、tɕh、dʑ、ɲ、t、th、d、n、p、ph、b、m、ts、tsh、dz、w、ʑ、z、ɦ、j、r,l、ɕ、s、h、ʔ。

② g-jaŋ la 是一个爱称，天峻、刚察等牧区话中指马牛羊等家畜，而在同仁、尖扎等农业区藏话中专指马。